

#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

刘洪涛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中国学者从1927年撰述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展现了深具特色的世界文学观:有“排中”的世界文学史,也有中国文学包含其中的世界文学史,后者更有利于呈现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在后一类世界文学史著述中,“中国文学”的位置有多种体现方式。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类著述强调东西方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世界文学史动力理论的探讨上,中国学者提供了阶级论、人性论、世界主义三种有价值的模式;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通史,其构成因素基本上只取那些在国别文学中“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而国际间对此却有更丰富、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 世界文学史; 东方文学; 西方文学; 中国文学; 世界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4)03-0068-06

世界文学史写作是国际间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研究现象。自歌德在19世纪初叶发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sup>[1]</sup>(P364)的热切呼吁后,将人类从古到今的文学视为整体,撰述一部世界文学通史,成为描述并展望世界文学的最有效途径。西方学者在一百多年间,留下了大量的相关成果。在中国,第一部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郑振铎的《文学大纲》<sup>[2]</sup>1927年面世,此后近80年间,中国学者的同类著述纷纭迭出。在此,笔者尝试对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通史类著述进行梳理,对其中体现的撰述理念、方法、世界文学史的构成要素加以研究,以期总结中国独特的世界文学观。由于打通国别、民族、语言限制的“世界文学史”承载着文学大同的梦想,又是推动民族文学步入国际舞台的重要手段,因此,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实践经验和哲学寓意值得我们深思。

## 一、“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 在场还是缺席？

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是中国学者完成的第一部世界文学通史类著述,此后近80年间,这类著述层出不穷。1949年以前的著述,除《文学大纲》外,还有李菊休、赵景深合编,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年初版的《世界文学史纲》;啸南著,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7年初版的《世界文学史大纲》;胡仲持著,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49年初版《世界文学小史》;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上册)等5种。1949年—1999年50年间,以“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史”标目的此类著述不下30种<sup>①</sup>。我将各种“外国文学史”看成世界文学史类著述,理由有二:第一,这类著述符合国际上多数世界文学史著述本国文学缺席的通例;第二,在中国的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讲授的是外国文学。在专业

[收稿日期] 2004-01-20

[作者简介] 刘洪涛(1962-),男,陕西省眉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这些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学通史类著述包括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二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二十四所高等院校主编《外国文学史》(四册,1980年起陆续出版),王忠祥等主编《外国文学教程》(三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杨烈主编《世界文学史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匡兴、陈婷、陶德臻主编《外国文学史》(讲义)(三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陶德臻、马家骏主编《世界文学史》(三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二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忠祥、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三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的范围内,外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其中的中国文学含而不论。“比较文学史”就是世界文学史,只不过它强调文学史上民族、国别间的影响和类型学相似罢了。

既然是世界文学史,那么著述者本国的文学要不要包括在其中?这似乎不是问题,但它的确产生了问题。这一问题在国外存在,在中国也存在。日本学者木村毅的《世界文学大纲》(朱应会译,昆仑书店1929版)不包括日本文学,苏联学者柯根的《世界文学史纲》(杨心秋译,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版)没有写苏联文学,但美国学者麦希的《世界文学史话》(胡仲持译,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却包括美国文学。可见,国外对此问题亦没有定见。

通观20世纪中国的世界文学通史类著述,尽管名称不同,以著述者所属国文学是否进入文学史为标准,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排中”的世界文学史。其中那些以“外国文学史”标目的世界文学史著述,因为是“外国”,自然把中国文学排除在外。需要重视的是那些以“世界文学史”标目之著述中“排中”的例子。李菊休、赵景深在1933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史纲》不包括中国文学。1949年以后,又有陶德臻、马家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史》,也不包括中国文学。因为有国外先例可循,两部文学史的编者不用为“世界”何以“排中”作出解释。但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们却忍不住追问,在世界范围内,为何有相当多这类排斥本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史?合理的解释,是世界文学史和国别文学史分属不同学科,其性质不同,目标和要求也不同。世界文学史本质上是研究异国异族文学的一门学问,它以探求人类文学发展共同规律为己任,概括性很强;以它有限的容量,当然也只能很简略。而这种概括性和简略,又与本国读者所需要了解的世界文学知识的规模、程度相适应,因此,过分细化是不必要的。国别文学史不同,它需要把本国文学的特殊性在更深入、更细致的层面凸显出来,它要求提供的相关知识是完备的,专门的。

第二类是中国加入其中的世界文学史。如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上册),啸南的《世界文学史大纲》,杨烈的《世界文学史话》,王忠祥的《外国文学史》,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史》等著作中,中国文学都占有一定篇幅。本国文学加入与否,本身无优劣之分。但从近80年来

中国学者著述世界文学史的经验看,“中国文学”的加入,的确是激活世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因素。对于上个世纪初刚从“一点四方”中土观念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学者,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联系起来,将“中国文学”看成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念的产生意味着重建中国文学体制,其积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分。

作者所属国文学怎么体现在世界文学史著述中?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绝对是一个世界难题。就中国而言,问题可能更大。首先,如前所述,世界文学史和国别文学史分属不同学科,要将它们硬捏在一起,难免要削足适履。其次,中国文学包含其中,是为了凸显本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文学史本身的结构,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占过多篇幅;世界文学史写作,要追求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但当中国文学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层面与它国文学并列摆放在一起时,类同关系的探究往往会伤害中外文学的具体性,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可能被阻断、割裂,许多个性被压抑和遮蔽;在研究方法上可能流于形式化和庸俗化。再次,被现今世界文学史类著述广泛引入的中外文学关系内容,或许会引起学者对中国文学“被纳入到外国文学的标准下被感受、被理解”,比较文学成为“我们自己文学的掘墓人”的担心<sup>[3]</sup>。

可喜的是,一些学者为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体系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例如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史》和王忠祥、聂珍钊的《外国文学史》。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史》共九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古代文学,以文类分目,如“神话”、“史诗”、“戏剧”、“抒情诗”、“小说散文”等,涵盖范围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的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第二部分为近代文学,以欧美文学为主体,但各章基本都有中西文学关系的内容。第三部分为亚非文学,有专节述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或按文类与它国文学杂糅交错在一起,或通过影响关系显示自己的存在,或以国别文学的独立形态嵌入文学史发展进程。这种既体现中国主体性,同时根据文学史实际,灵活处理主体国在文学史中存在形式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 二、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模式

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史著作,一个最突出

的特点是东西二分,强调和突出东方文学的地位,1949年以后尤其如此。

正如中国学者屡屡指出的那样,在西方世界文学史著述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早期欧洲学者眼中,世界文学就是欧洲文学。迪马说:“中世纪无疑是个文学世界化的时代。……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各大文学和总体文化流派……无不带有世界化的性质。”<sup>[4]</sup>(P15-16)这一把欧洲文学等同于世界文学的见解,在韦斯坦因等许多比较学者那里都多少存在着。

在文学史著述中,也有一批欧洲、美国、日本同类著述在逐渐扩大“世界”的涵义,并给东方以相应的地位。这种结构,还见于其它多种世界文学史,如沃尔特·布莱克的《世界文学史》<sup>[5]</sup>,沃勒·弗里德里克的《文学大纲》<sup>[6]</sup>,木村毅的《世界文学大纲》等,这些著述,都包含了东方文学,这反应了西方意识中的世界文学范围的扩大。但它们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西方文学是主体,东方文学只是推动西方文学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源头之一,外援性影响因素之一。这种欧美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主体的观念极少发生过动摇。

了解了西方学者世界文学史著述的概貌后,反观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史,它的特点就鲜明地呈现出来,这就是真正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东西二分,强调和突出东方文学的地位。如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前言中说:他们的教材有一大特色,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形成‘两条线’体系,全书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大部分”<sup>[7]</sup>(P1,13)。在我国高校世界文学教学体系中,亚非文学是东方文学的同义词。从编者的这一言论,可见中国学者在排除“欧洲中心论”影响方面是相当自觉的,他们视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突出东方文学,突出东方特色为神圣的责任。当然,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不同时期,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史著述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并不完全相同。70年代突出亚非文学的地位,是我国反帝反修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对亚非文学成就的强调,成为东方大国中国文学成就的一种隐喻;在当前前后殖民主义理论背景下,亚非文学的存在,还担当着与西方文学相对的批判者和对话者身份。

亚非文学的意义在哪里?学者们对此也作了总结。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亚非卷)提纲

挈领地指出:“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发源地。”<sup>[8]</sup>(P1)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更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亚非文学的世界意义:“亚非古代文学有过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对希腊罗马文学有过重大影响。亚非中世纪文学百花齐放,空前繁荣,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亚非近现代文学富有民族民主革命精神,汲取了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养分,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家作品。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亚非文学,与近代、现代欧洲文学交相辉映。”<sup>[7]</sup>(P1)对亚非文学的成就及其表述,各家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教材进一步认为,“中古时期的东方文学,其成就远远高于西方”<sup>[9]</sup>(P2)。对近代亚非文学的评价,就有“走入低谷”之说,编者认为这是由于亚非各国“受欧美资本主义的侵袭,不少国家沦为殖民地,经济文化倍受摧残”的缘故<sup>[10]</sup>(P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学者对亚非文学成就的评估,分散在世界文学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亚非文学是一极,欧美文学是另一极,亚非文学在和欧美文学对照应和中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作为世界文学的两大支柱之一,亚非文学在文学史中如何表述,学者们也作了一些尝试。一种是东方和西方篇章独立,互不干扰,在比例上有的相等,有的西方三分之二,东方三分之一。例子如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及陶德臻、马家骏主编的《世界文学史》。陶著《世界文学史》前言中对此有所说明:“采用东、西方文学各成系统又彼此结合的体例,改变过去教材中的西方文学部分横向分段过细的作法,而加强对各国各地区文学纵向发展的整体评述,同时也注意横向的影响与比较”<sup>[11]</sup>(P1)。另一种情形是混合交叉,在一个统一的文学体系中展开叙述逻辑。古代文学中,东方文学占有绝大份额,近代文学欧美占优势,现代文学东方和西方平分秋色。例子如24所高校的《外国文学史》。其前言宣称,这部文学史“在编写上采取的是东西方文学合一的方式。这是本书在内容和体例上的一个新的尝试。”编者还具体描述了这种处理方式的优越性:“我们认为这种东西方文学合一编写的方式既便于探讨世界文学出现前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便于分析世界文学形成后各国文学繁荣与衰微的历史和政治原因。”<sup>[10]</sup>(P5,6)不管哪种模式,都给与东方文学以崇

高的地位。

### 三、三种世界文学史动力理论

在世界文学史发展动力的探讨上,中国学者提供了阶级论、人性论、世界主义三种有价值的理论。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而席卷全球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著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是顺理成章的。如苏联学者柯根的《世界文学史纲》,翻译者在译后记中赞扬作者说:“著者完全正确地把握着史的世界文学发达之总流及其几个主要契机,辩证法地跟随着其发展,用科学的唯物论的眼光考察各种文艺思潮之形成、发展,及其转变之过程与各种文艺思潮相互交替之社会经济背景,然后系统整然地再现之于这本短小精悍的书上。”<sup>[12]</sup>(P527)这说明了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匡兴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讲义)中说,“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所坚持的指导思想。”<sup>[9]</sup>(P3)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者著述的世界文学史中的应用,具体被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二者各有分工: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用来描述文学史发展的线索;辩证唯物主义主要用来一分为二地评价作家,保留其精华,批判其糟粕。二者的实质都是进行阶级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文学史分期,在整体格局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的阶级划分基本一致。上古文学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末期起,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灭亡止。中古文学大体上从476年起,到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以前,其性质是封建文学。近代文学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止。性质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现代和当代文学主要指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包括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文学发展的动力在于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学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阶级斗争并进步阶级取代落后阶级的历史。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文学史发展的高峰很自然被安排为苏联以及其它进步国家“社会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时代的到来,而

此同时,西方文学则走向没落。面对西方20世纪文学事实上的繁荣,80年代的教科书将其描述成颓废文学,认为是昙花一现。如朱维之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直线进行的,欧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然而,不管在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多么复杂的情况,也不管今后世界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和波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兴盛和资产阶级文学的衰落,已是无可怀疑的历史的必然。”<sup>[8]</sup>(P9)

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文学本身的认识态度上。匡兴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讲义)中指出:“无论是对外国的古典文学,或是对它的现当代文学,我们都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地继承和吸收的思想原则,运用批判的研究方法,给予恰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sup>[9]</sup>(P9)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从古到今的西方文学呈现出的主要是其阶级认识的价值:荷马史诗反映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这一历史阶段的各方面特征。但丁的思想与创作中的矛盾,表现了中世纪与新时代交替阶段的阶级矛盾。在欧美,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从中可以认识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从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到20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反映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sup>7</sup>(P5)。具体到单个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将作家的整体创作分解为进步性与弱点,先进性和反动性的矛盾二重性。

在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史著述中,阶级话语不是中国学者所奉的唯一圭臬,还有其它理论,如世界主义。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时代”,意味着“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sup>[13]</sup>(P43),共同迈向“世界文学时代”。

将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看成是逐渐打破孤立割裂状态,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有机统一体的过程,这种描述和期望,体现在世界文学史写作中,就是追求世界文学共同体的来临。于是,“走向世界文学时代”这种进行时态成为一些文学史的叙述模式。例如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史》。这部著作的绪论,标题是“走向世界文学”。作者把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看成一个能够突破种族、国界乃至文化体系界限,相互关联的整体,它基于人类的共同通根性

和交往活动。他从发生学、接触学、类型学等角度寻求这种共同性,并呈现出“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的美好图景。他因而称自己的这部文学史是一部“从国际的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和文学学术”,“超越民族界线”的文学史<sup>[14]</sup>(P15)。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这部1999年出版的力作与1985年他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相比,在方法论上有重大变化,就是对“比较”方法的自觉应用和对各阶段“世界文学”的描述。如“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文学”、“20世纪的世界文学”等节,在“进行东西中外文学比较”中,文学的统一观和整体观形成了。

人性论模式是中国学者世界文学史著述所采用的第三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其实这种叙述模式在五四时期周作人所著世界区域文学史《欧洲文学史》(1917)中已经有过成功的应用。这部世界区域文学史上起古希腊神话,截至18世纪末。周作人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人性的反映,而人性二元,即情感和理性。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希腊文学代表情感,另一源头希伯莱文学代表理性。其后从中古到19世纪的欧洲文学,就是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的交替出现,也即是人性二元的交替出现。这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强调源头的原创和规范作用。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影响了后来更重要的文学史著述《新文学的源流》的写作。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沿用了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的思路,但它剔除了历史循环论,将进化论和人性论结合起来。他把文学史的发展解释为人性的发展进化过程和对人性的理解逐渐深化的过程。基于人性的共同性,世界文学具有了整体感。这种叙述方法,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反拨,清除了以往文学史中严峻的阶级认定和甄别,有利于实现世界文学整体性的构想。

#### 四、世界文学史构成因素

当文学史写作具体到作家、作品的层面时,撰述者将面对浩如烟海的文本及其相关材料。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如何从中清理出一个合乎逻辑、呈现明显阶段性的历史线索?这其中尚有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处理。

从中国的经验看,我们在处理庞大的文学素材

方面,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理论上的障碍。韦勒克提出过世界文学的“多层次”说,他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sup>[13]</sup>(P43)。世界文学的后两层涵义具有共同性,即以世界为幅员看待文学的实际存在,区别在于,前者描述世界范围内文学的量,后者指向世界范围内文学的质。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史,基本上都只取那些在国别文学中“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

世界文学史包含的内容是否可以有其它选择?从西方学者的长期实践看,有许多经验和理论值得我们借鉴。梵·第根在《总体文学概说》中,讨论到世界文学史的写作。他认为,国别、民族文学史中的杰作并不必然能够进入世界文学史,当撰述者摆脱国别、民族的限制,从整体上思考文学的历史存在时,它的对象和内容会发生变化,“真正的国际文学史绝对不只是各本国文学史的综合体”,世界文学史的价值观与国别文学史的价值观应该有所不同<sup>[15]</sup>(P145)。罗马尼亚比较学者迪马对梵·第根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能够进入世界文学史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那些结构相似的作品、流派,以及在同一时代(或相近时期)、在相近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在不同的民族同时出现的创作个性;第二,那些或是由于作家本人、或是由于作品蕴含的思想感情、或是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对其他民族文学产生明显影响的文学现象;最后,是那些不仅仅由于本身的传播过程,而且还由于自己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而得到了超越自己语言领域的传播的文学现象。”<sup>[4]</sup>(P19)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科学院组织力量撰写了雄心勃勃的9卷本《全世界文学史》,在此过程中,他们对世界文学史的内容因素也进行了探索。苏联学者也同意这样的意见:世界文学不应该被看成各国文学的机械地累积起来的总和。在处理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时,苏联学者认为,国别文学应看成是“低级文学单位”,它们的历史流动形成高级的文学单位“世界文学”,这一文学现象互相制约,并在世界历史过程的系统内发展着。每个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方式,不仅以其国别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而且还以它与其它文学的相互关系——发生学、接触学及类型学上的关系——所构成的有分支的系统<sup>19</sup>。这一观点强调了世界文学发

展的动态平衡,以及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愿望。

世界文学史撰述蕴含着人类渴望摆脱孤立状态,走向一个相互联结的共同体持久冲动;同时它也为各民族弘扬自己的文学提供了绝好的场所。这正如全球化进程加剧,而民族意识也在同步增强一样。由于撰述者的国籍、民族身份以及意识形态

诸问题,各自笔下的世界文学史观必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世界文学史撰述需要客观性和整体性,以摆脱狭隘的民族、区域界限,但民族地方利益也常常是撰述者写作的重要动机。世界文学史就在民族—世界之间摇摆着寻找动态平衡。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学史撰述中同样体验到这二种相反但同样真实的情绪。或许,世界文学史的魅力就来自这种自相矛盾中!

#### [参考文献]

- [1] [德]歌德. 歌德谈话录[A]. 朱光潜全集:第17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 [2] 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第15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 [3] 王富仁. 比较文学研究不能忽视内部比较[N]. 中华读书报,2000-09-09.
- [4] [罗马尼亚]亚历山大·迪马. 比较文学引论[M]. 谢天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5] Walter Blair.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Knowledge Incorporated, Chicago, 1941.
- [6] Werner P. Friederich. *Out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4.
- [7] 王忠祥. 外国文学教程:上卷前言[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 [8] 朱维之. 外国文学史:亚非卷[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 [9] 匡兴,陈惇,陶德臻. 外国文学史(讲义):上册前言[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10] 二十四所院校. 外国文学史:第1卷前言[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 [11] 陶德臻. 世界文学史:上册前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12] [苏联]柯根. 世界文学史纲:译后记[M]. 杨心秋译. 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
- [13] [美]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4.
- [14] 曹顺庆. 比较文学史[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15] [法]梵·第根. 总体文学概说[A]. 戴望舒译. 刘介民. 比较文学译文集[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16] 陆肇明. “世界文学”与久里申的“文际共同体”[J]. 中国比较文学,1997,(3).

(责任编辑 连铤 责任校对 连铤 潘国琪)

## Re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World Literature: Principles in Compiling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IU Hong-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a set of issues that have long puzzled the scholar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 Should Chinese literature be included in historical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i) And if yes, what kind of status the former should have in the latter?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paper has found that actually Chinese scholars have already supplied answers of value for these questions. In other words, Chinese scholars emphasize the dualistic opposi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e contribution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made to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contributions are embodied in the three valuable models — Class Theory,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Cosmopolit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ynamic theory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Subsequently, some other related issu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eastern literature; western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